

【文化杂谈】

一位作者说，“依附于书籍上的神性，如今已被斑驳得不成样子了。”那么，依附于读书人身上的灵性与虔诚呢？他们的神圣感、使命感在现代商业文化的诱惑下早已堕落得粉身碎骨，却依然要端着副“读书人”的派头。

多年以前，我读过周泽雄先生的杂文《我们为什么写书》，文章精悍有力、气韵生动，他在文章中尖锐抨击了知识界普遍存在的轻浮与功利，给我印象深刻。在阅读这篇文章的一年后，同样是这篇文章，却被人斩头去尾、改头换面地以《为什么出书》为题“重新”发表了一番。我曾经询问刊发此文的编辑，对如此堂皇的抄袭行为是何态度？这位编辑吭哧了半天说：这位作者（指抄袭

我们为什么还要读书

□施京吾

者)也是一位老作者了。如此解释，实在幽默，真不知道“老作者”三字何以成为抄袭者的免罪符。稍后几年，亦出现多起教授抄袭案例，抄袭者名气越来越大，抄袭的字数也越来越多，惹得学界一片哗然。但对此我已见怪不怪，既然老作者抄得，教授何就抄不得？这些号称“知识分子”的家伙就这样对知识进行了无情的嘲讽，文化队伍有这样的高级痼疾真令人无比惊讶。

进入近代世界，知识完成了技术和人文的分野，前者却将人物化成一种同样可以操作的工具，正是这种工具性遮蔽了人文精神的光泽，并将其驱赶到逼仄的胡同进行一番技术化的改造——从此，读书不再是名门事业，只是一帮伪读书人任意图解、用以粉饰思想苍白与精神空虚的迷彩服，是在社会交往中讨价还价的筹码。

然而，我们究竟为什么还要读书？

读书，不是在已有的古训中寻找生命的庇护，在人类文明艰难的行程中以求全身而退；读书，不是把自己的思想蜷缩于历史的教条中，在强权的阴影下亦步亦趋；读书，也决不是为了迎合现实的平庸做精心的媚俗准备，以期在某个幕后交易中平步青云、飞黄腾达。

不幸的是，读书人的庄严与庄重却在文化商业化的洪流中消解得无影无踪，使文化变成一种可以在地摊上随意兜售、贩卖，可以随街就市的劣质商品，甚至还作出惨兮兮的可怜状以便待价而沽，只为卖出个更好的价钱——我清楚地看见过一位曾被追捧为“青年才俊”的知名作家，曾经那样义愤填膺地控诉社会不公，可谓字字血、声声泪，为此赢得一批颇为壮观的读者群。后来他“成功转型”，一转眼又开始声情并茂地讴歌起社会。当然，批判对象还是有的，如对西方殖民话语、霸权体系就充满了义愤，沉痛感简直撕心裂肺，这回为自己赢来的肯定不是只会虚张声势而毫无实际利益的读者了，不信问他自己。

由这样的读书人晋级而成的写书人，哪里需要什么独立的人格、圆融的智慧？是有怎么样的读者就有怎么样的作者，还是有什么样的作者就有怎么样的读者？无论怎样，实在是一副互相恭维而后又互相诋毁、互相攻讦的滑稽样。他们共同伪造出了一个蔚为大观的文化市场——正如那位曾经的青年才俊，原本理荒情浓，而后则不时陷入虚构大义之中。

不可否认，文明的进程给我们带来了太多的知识，在这一幅幅波澜壮阔的文化画卷上我们已不太容易做出如哥白尼式的、康德式的、1789年法国式的革命，然而，我们仅此便以为理解了这些革命的全部本质与意义，从此把书本及其文化以及全部人类文明看作放在计算器里便可轻松解读的公式，把读书人造成“向钱看，齐步走”的当代俗物，这又岂止是知识界的不幸？

解读历史、寻根问源，此乃贤达境界，对于普罗大众或许是个太高要求，不能要求每个读者都随时随地饱含慧眼、洞穿真相，那我们不妨追问一下自己，在滚滚而来的商业大潮面前我们是否还保留了一些读书人的独立、淡泊与尊严？尽管已不必再将读书的目的终极化，一定要去承担怎样的使命，但如果我们对书本还留有一点真实的恋想，至少总该有些真诚与诚实，至少总该有些情调与境界吧。

那么，我们为什么还要读书？我对自己的回答是：只是为了让自己活得清清楚楚、正大光明。

(本文作者为文史学者)



悦读·分享

扫码关注齐鲁晚报
副刊微信“青未了”。

地球上最倒霉的蒲公英

□林少华

【窥海斋】

不知是不是跟我的乡下出身有关，反正我特别中意乡下出身的不起眼的花，比如蒲公英、牵牛花和野菊花。这不，当大家一齐扬脸看满枝满树樱花的时候，我宁可独自看树下零星星星的蒲公英。多好看啊，嫩黄嫩黄的，黄到心里去了，真想俯下身亲上一口；多顽强多机灵啊，草还没返青它就花朵送出来了。我仔细观察过，迎春花都没它开得早，是它，是蒲公英将春天的喜讯第一个带给人间。因了它，山坡有了金色的星星，河边有了动人的笑靥，路边有了眨眼的眼睛，草坪有了黄艳艳神奇的图钉……

清晨，惠风和畅，天朗气清。我沿着小路在约略呈弧线形铺展开去的草坪间缓缓踱步。由于少雨，草坪的确还没怎么返青，泛青。但有两种花已经开了。一种花是不显眼的紫花，花朵很小，如紫色的老式耳环，又如小得多的眉豆花，单开的极少，或三五簇像受惊似的挤在一起，或密密麻麻缀成一小片。董菜花？紫罗兰？我的植物学知识太差了！另一种花就是蒲公英了，它显眼得多。有的紧贴着地皮屏息敛气，有的伸出吸管似的细脖颈摇头晃脑。不骗你，远看真的如金黄色的图钉。而细瞧之下，又未尝不像深情的眸子。不由得，我倏然想起了几十年前邻院的少女。尽管她的衣服颜色灰不溜秋，但那对眸子总是光闪闪水灵灵的，看我一眼，我的心就抖一下，看谁谁抖。山村的精灵，苦难中的美丽，男孩的春梦，游子的乡愁……

我就这么边走边看，边看边想。

忽然，我看见一位四五十岁的女士蹲在草坪上，缓慢移动着一下下挖什么。近前一看，原来在挖蒲公英，蒲公英！而且是开花的蒲公英！右手拿一把扁嘴铁锤样的东西，一上一下，一下一朵，百发百中。她虽然身体移动得慢，但手的动作快。她的身后，蒲公英没有了；她的眼前，蒲公英被她连根刨起，右手刨，左手捡；左手捡，右手刨。刨一下，我的心抖一下。

她刨得太专注了，如入无人之境。大学生们欢快的笑声也罢，清洁工迟疑的脚步也罢，她都无动于衷。我停下脚步看她，相距不过十步远，她似乎没意识到有人看她。她只看蒲公英，只顾重复刨与捡的交替动作，而且越来越快，渐入佳境。我也看蒲公英，看蒲公英一株株，一朵朵落入她挎的布囊中。刚才的文学情思早已不知去向，我的心开始隐隐作痛。如果我是蒲公英，肯定跳起来给她一巴掌，问她：为什么这样？熬了整整一个冬天，好不容易熬到开花时候了，却连个花也不让人家好好开，我蒲公英惹着谁了？为什么这样？

是啊，为什么这样呢？我也想知道。可我当然不能问，不敢问。一来这里不是我的校园，二来总觉得这不大像是一个人对一个陌生人开口说的第一句话，何况是一个男人对一位陌生女士。但我终于没有忍住：“这东西能吃吗？草坪有时是喷药的……”对方头也没抬，低声回答了一句。我没能听清，少顷，快快转身走开。

隔一天再去的时候，毫不夸张

地说，偌大草坪——连起来足有两个足球场加三个篮球场那么大——几乎连一朵蒲公英都找不见了，蒲公英全军覆没，金黄色的图钉尽皆拔掉，深情的眸子了无形影。

她为什么这样？她为什么必须这样？作为女性市民，难道她不知蒲公英是美的？不懂欣赏蒲公英的美？

若是过去倒也罢了。比如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天灾人祸，休说蒲公英，连榆钱、榆树皮都生吞活剥了。不信你听听莫言怎么说的好了。他这样说道：“我们就是一群饥饿的小狗，在村子中的大街小巷里嗅来嗅去，寻找可以果腹的食物。许多在今天看来根本不能入口的东西，在当时却成了我们的美味。我们吃树上的叶子，树上的叶子吃光后，我们就吃树的皮；树皮吃光后，我们就啃树干。那时候我们村的树是地球上最倒霉的树，它们被我们啃得遍体鳞伤。”须知，这并非小说情节，而是莫言2000年3月在美国斯坦福大学的演讲。作为感同身受的当代人，我当然知道他说的句句属实。

是的，那时我们村的树也是地球上最倒霉的树，遍体鳞伤，体无完肤。那有什么办法呢？较之树的生存权，毕竟人的生存权是第一位的。至于美，更无立足之地。我总不能理解和难以接受的是：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城里人基本吃什么有什么，不少人都吃出“三高”了，而大学校园草坪的蒲公英却成了地球上最倒霉的蒲公英！

(本文作者为著名翻译家、中国海洋大学教授)

取景框里的“自我世界”

□刘志勤

【生活直击】

每次谈及中国文化的特点，人们总爱用“宽容”来形容中国人的大度和胸襟，甚至也常用来表达对仇人、对伤害过自己的人和事的宽大。许多城市也把“宽容”作为该城市“精神”大加宣扬。在中国，“宽容”应当是属于知名度和使用频率最高的词语之一。

但是，当中国人拿起照相机拍照的时候，人们会发现小小的取景框里却缺少我们耳熟能详的“宽容”两个字。在刚过去的“五一”假期中，笔者听到的埋怨和牢骚并非车多路堵、人满为患，而是人们在取景框里的排他和自私的争斗。

大多数中国人在照相的时候，都喜欢先“清场”后照相，就是要把取景框中的任何其他无关人士“请”开，方才照相。这本无可厚非，也是每个人应有的权利。如果游人稀少，或不影响他人同样权利时，这种做法完全没有问题。但是如果是在旅游高峰，在游客如织的景点，人人都想在取景框中只留自己需要的人影真是有点困难。我们常常看到在一些标志性景点之前会堆积着许多人，为的是能够留影纪念。然而，为了达到取景框中无“闲杂人员”，人们相互推搡，还有恶语相加，更有家长把孩子推到第一线去抢占有利位置，其他人稍有不满，这些家长们马上会批

评对方“没有素质”、不该和孩子争抢。本是美景，却留下遗憾，而最重要的是给孩子留下极不好的范例。在这一刻，人们在课堂，在其他场合学到的“宽容”被挤出了小小的取景框，留下的是自我和孤独。

如果细心一些，我们也会看到许多人有着另外一种心态。我们几乎没有见到过外国游客在照相时需要“清场”的情形，很多外国家长在给孩子拍照时，并不在意站在旁边的游人会破坏美景，而是鼓励孩子和周边客人友好相处。笔者的很多外国朋友在游览中几乎不拍私人景照，问他们为什么不“留此存照”，以证明“到此一游”？他们的回答几乎都是一样：不打搅别人，同样能欣赏到美景。

中国人在日常社会活动中还有很多颇具中国特色的“怪”举令人叹息，取景框中的“自我”只是众多“怪”事的一种。这些“怪”无不展示了中国人特有的聪明或精明，最终的受益者肯定是他们自己，而他们占的便宜总是建立在旁人受损受伤的基础之上。其中可以和“取景框”相媲美的当数“集体夹塞”。我们可能都遇到过这样的情形：当你辛辛苦苦排队购物、购票或缴费即将轮到你时，你前面的人会突然告诉你，他还有其他几个人也在排队，看到这边

速度较快，马上就集中到你所在的队伍中，把排在后边的人气得牙根发痒，却很无奈。这种现象在医院里更是常见，似乎成为一种见怪不怪的行为。然而，如果放在西方发达国家，这种凸显自私的举止必然会受到公众的冷眼、鄙视甚至厌恶。中国旅游者在国外的类似行为早已被媒体和公众诟病。

其实，“宽容”并不是一个高不可攀的境界，它和知识多少、职务高低、地位贵贱毫无关系，它就是一个心态、教养和习惯问题。在当今复杂多变的社会，做到“宽容”是能让社会平和、人人幸福的基石。我们每个人每天都在用自己的取景框工作、生活，在和人交往，如果取景框中只有自己，只能证明你是心胸狭隘、视野窄小、在事业上难有大作为的“常戚戚”之辈。

中国古人曰：君子以义为质，礼以行之，孙以出之，信以成之（《论语·卫灵公》）。凡成大事者，皆能从小小的取景框中找到大千世界，更能窥测宇宙之浩渺。我们的视野不能被限制在三寸框中，而是要放眼框外世界。心态要宽容，智慧会深远，生活就幸福。

一切就这么简单。

(本文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